

# 第一章

## 中国文坛的早春

(1977)

对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被彻底砸烂、被重创的文艺界来说,1977年,无疑是开始复苏的一年。尽管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人们还噤若寒蝉,但毕竟呼吸到早春的气息了!作家艺术家们互相舐舔着身上的伤痕,强压下悲愤的叹息,在会心的微笑中,开始捡拾起已经生锈的武器,准备重新回到十年前“犁庭扫闾”时被扫下来的那个舞台上。但,除了内外伤痕亟待抚平外,谁都痛切地感到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人都在无言的沉默中变老了!古训有曰:“哀莫大于心死。”这才是中国作家最大的悲哀!我在这一年当中也回到了文艺岗位,亲历和目睹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段历史。作为一个见证者,一个小小的编辑,在这里,我将尽可能忠实地从个人的角度记下我所看见的和经历的一些事情。

### 重回文艺界

我是1971年6月从天津静海团泊洼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

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的七个人中的一个。<sup>①</sup>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文联工作,习惯了文艺界那种比较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尽管在“文革”中尝够了“文化工作危险”论之苦,尽管在新华社这样被人羡慕的中央新闻单位工作,并且尝试做过翻译、记者、编辑等多种工种,却还是感到不很适应新闻单位的严格纪律和刻板的生活,于是就斗胆地向社里的各级领导提出申请,并终于获准于1977年6月底离开前后工作了七年之久的新华社,重回阔别了多年、如今正在重建中的文艺界。

正确地说,虽然《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中国摄影》等几家刊物已经陆续复刊,但分属于出版局、国务院文化组、新华社等单位管辖,而“文革”中被撤销了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联谊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摄影艺术联谊会,都还没有恢复工作,“文革”前的许多知名文艺工作者都还没有分配工作,有的还没有做出政治结论。应该说,“文革”结束后的新的文艺界还没有真正形成。

我到东四八条52号《人民文学》杂志社报到的时间是1977年7月7日。《人民文学》杂志社所在的这栋四层楼,“文革”前我就很熟悉,原来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办公楼。进门的影壁上,写着毛泽东专为该院成立题写的“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八个飘逸洒脱的毛体大字。1957年秋天,我的同乡和同学董润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慕名而来,先后投到张庚、傅惜华的门下,所以我也常来此地闲谈。“文

---

<sup>①</sup> 其他六人是:陈大斌,原来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干部,后来先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组长、《瞭望》杂志第一任总编辑;方杰,原来是中国电影联谊会的干部,到新华社后被任命为国内部文教组的组长,不久离开新华社担任了《人民电影》杂志的副主编,后调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郭玲春,原来是电影剧本创作室的干部,后来成为新华社国内部文教组的著名记者;苟玉生,原来是电影剧本创作室的干部,分配在新华社国内部,不久病逝;殷可善,原来是中国曲艺研究会的干部,到新华社后调任西藏分社记者;另一位调任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组任编辑记者,名字记不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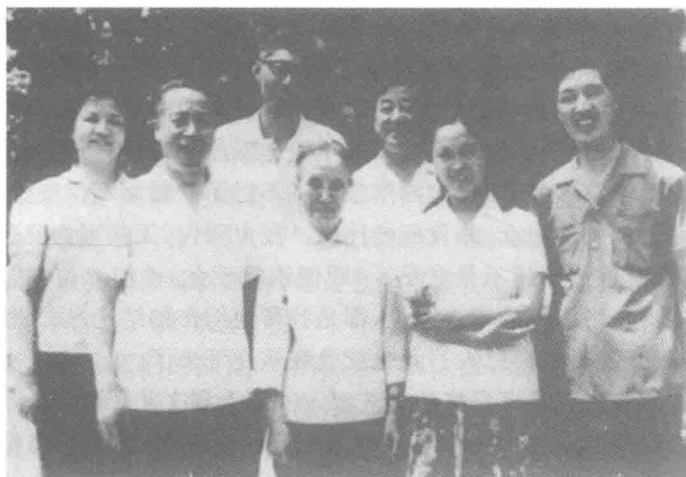
革”之始，在混乱之中也曾不止一次来此楼内看过大字报。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于1969年9月30日（据传，不让这些人在京过二十周年国庆节）被一锅端，用几辆大卡车把我们从首都北京拉到了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的北沿的一片荒滩上，在此安营扎寨，从此开始了“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生涯。在文化部所属的这所“五七”干校里，上述三个单位组建为一个连（第三连）。我们从此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我下放干校有一番曲折的过程，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干校的第一个地点是官厅水库北沿的荒滩上，在那里过了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妻子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军宣队的电报，要我火速回京。我像是被装在闷葫芦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京后，姓薛的军宣队首长向我宣布：“文化部干校不准带家属，现在你跟着（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干部到河南罗山干校去。今后你的工作由我们负责了。”不容分说，我乘坐丰沙线火车连夜赶回文化部干校，向领导们说明事情原委后，拿了行李再往北京赶。根据军宣队的指示，在规定的五天内，把所有的家当处理干净，把一部分书籍七分钱一公斤当废纸卖给收破烂的，一部分运到建内大街5号文学所的资料室暂存，把和平里东街3号楼的住房也交出去，拖儿带女，随着学部的下放队伍一起，乘南下的火车，去了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明港的一个军事学校，稍事停留后，又转道去罗山干校。从信阳乘长途汽车到罗山，但见公路两旁，迤邐于途都是一排一簇的小坟头，像些小土堆，那就是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直折腾到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发生的著名的“信阳事件”中饿死的农民们的葬身之处。为此事件，党中央曾发了专门的文件。直到1979年读了河南作家张一弓写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罗山有一个很大的劳改农场，我们的干校就是这个劳改农场的一部分。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何，干校又迁移到息县东岳公社的一个荒滩上。我在那里一直待到1971年6月。我属于那种“人还在、心不死”的人，我对于国家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这样甩包袱不要了，真有点儿于心不甘，

于是我向学部干校的领导提出回文化部干校,并得到了批准。

我带着我的小儿子刘方离开息县东岳公社,回文化部干校去。妻子和她年迈的母亲、退休教师黄惠连先生,带着女儿刘青继续留在息县学部干校。这时,文化部干校已从官厅迁移到宝坻,在宝坻还没有站住脚,又迁移到天津南郊的团泊洼滩涂地带。我带着儿子背着行李从信阳上车,途经北京转车到天津,因在北京的宿舍已经被他人所住,没有落脚一夜的地方,只好央求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的留守公务员打开资料室的门,借住在资料室的水泥地板上睡了一夜。那一夜,我体验了无家可归、不得不求人的苦涩滋味。到了团泊洼干校,我这个“文革”中的修正主义苗子“黑线人物”竟然又被军宣队看中,叫我代替年逾古稀的戏剧理论家晏甬老前辈,担任了三连连长,管一连人的吃喝拉撒睡和带领大家劳动生产。我接受这份重托,每天背着当时才五岁的儿子下田干活。由于分工只管吃喝拉撒睡和劳动生产,不管政治运动(由副连长、戏剧史家郭汉城分管),而且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阶段已经过去,所以两派群众我都一视同仁,连张庚啦、吴祖光啦这些“文革”初期曾经被视为“黑线人物”的老文艺家,我也都对他们客气和尊重,同是“天涯沦落人”嘛。半年后,我就被第一批分配了。我们几个人的分配工作,给干校全体人员一个吉祥的预兆:我们这些“裴多菲俱乐部”里的文艺工作者国家还是需要的,不会不管了!

从来也没有想到,事隔十多年后,我竟然又来到了原中国戏曲研究院这块熟悉的地方!《人民文学》的办公室在二楼。接待我的是副主编刘剑青和负责人事工作的编辑部负责人陆耿圣。刘剑青是熟人,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并在华北联大学习过,“文革”前在《文艺报》做编辑,写文章常用宋爽这个笔名。那时,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研究工作,都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里办公;我们又都住在和平里文联作协宿舍,楼上楼下经常见面。这次我调到《人民文学》工作,首先是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的。陆耿圣是位女同志,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复刊时列入出版局下属单位,所以把她调来主管行政党务。她虽然与我不认识,但对我的到来也很热情。



(自左而右)柯岩、张秉贵、崔道怡、冰心、王愿坚、王南宁、周明

《人民文学》杂志复刊于1976年1月,“四人帮”当政时期。袁水拍任主编。粉碎“四人帮”后,领导班子很快就改组了。我调来时,编辑部设有小说组(组长是涂光群)、散文诗歌组(组长是周明)、评论组。我被分配到评论组。评论组没有组长,领导上让我当组长。组里原有的颜振奋调到《人民戏剧》去了,我来时只有阎纲和吴泰昌二位。他俩“文革”前都是《文艺报》的老编辑,我的老相识。阎纲“文革”前与我住在一栋楼(和平里十区3号楼1单元),他住二层,我住四层。“文革”中,我因文艺黑线问题和苏修特务嫌疑、海外关系等受到单位造反派和街道红卫兵的冲击,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揪出来,隔离起来并关进所谓“牛棚”,受到审查和抄家。那时,阎纲、刘茵夫妇多次为我鸣不平,到处替我说话:“刘锡诚算什么走资派?!”在那种乱世之中,儿女亲情都荡然无存,还有人能站出来替我这个在机关和派出所里都挂了号的人说话,所以我一直铭记在心,一直很感激他们。我和吴泰昌虽然没有那样熟,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凡是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待过的人差不多都是熟人,况且我们又都是北大出身,都做过杨晦的研究生。“文革”中,他与我们文联副秘书长阿英的女儿钱小云结为连理的故事,当年在文联大楼几乎人人耳熟能详。

真可谓是“山不转水转”，经历过乱世之后，我们三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来了，而且能与这两位老编辑老熟人共事，我感到非常高兴。唯一使我感到难堪的，是让我来当组长。我对老文学界的人头、情况，都不如他们二位熟悉。我的年纪比泰昌大，政治历练和工作经验可能比泰昌多些，但比起阎纲来可就不行了。阎纲不仅资历长，重要的是他的才华出众，非我所能比肩。我也明白，无非因为我是中共党员，那时他们都还不是党员。（顺便附笔于此，他们二位在“文革”中参加群众组织等的审查结论，都是我帮他们作的结论；后来他们入党，也都是我做的介绍人。）我也就勉强接受下来了。

主编张光年是老资格的文艺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现在是国家出版局的顾问。在文艺界的老作家评论家中，他大约是最早被安排工作的为数不多的老一辈领导人和文艺名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是《文艺报》的主编。“文革”初期，被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拉下马来，受到群众组织和中央专案组的审查，被扣上“文艺黑线干将”的罪名，并于1969年10月与作家协会两派群众组织以及领导干部一起，下放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1年干校开始陆续分配干部，继而咸宁干校撤销，合并到天津南郊静海团泊洼干校后，他又于1975年10月6日到了静海干校。但他只在那里待了13天，就于10月18日接到回京通知，文化部留守处遂向他宣布了审查结论（定性为“严重路线错误”），随后他被安排在国家出版局当顾问。据张光年的日记，他作为出版局的顾问，曾参与了《人民文学》创刊的工作。他在1975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记着：“上午偕严文井到（东四）八条《人民文学》编辑部听取筹备工作情况。先由袁水拍介绍同编辑部同志们见面，随后是小会。刘剑青汇报了编辑工作进展情况。卢更生（按：应为卢耿圣）提出了调干、房子、家具等问题。袁水拍、严文井、李希凡就第一期内容各自提出了补充意见。我表示将这些意见向出版局领导及时转达。”<sup>①</sup>

1976年10月6日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日子。党中央一

<sup>①</sup>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举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人民重新获得了光明和自由。万民欢腾。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现袁水拍与“四人帮”的瓜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因此免去了他《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于是，张光年走马上任。平常他并不来上班亲政，日常工作由副主编刘剑青掌管。刘剑青在“文革”前就是他的属下，所以他是比较放心的。

编辑部还有一位“四人帮”当政时期从上海调来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施燕平。我调来编辑部时，他正接受审查，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写交代材料，不讲话。我与他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据我较长时间的观察以及听老编辑们的发言，他陷得并不算太深，无非是个忠实执行者而已。审查结束后，他调回上海，担任了上海大学文学系的主任。

我报到后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刊物上要发表一篇围绕着《人民文学》的复刊问题与“四人帮”斗争的批判文章，指定由吴泰昌执笔、阎纲修改、刘剑青定稿。参与讨论的还有傅活（他“文革”前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人员，我们算是干校中的战友了！从80年代末起，他先后担任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的主编和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的副主编）和杨筠。通过几次旁听，我明白了个大概。“四人帮”企图把《人民文学》办成上海《朝霞》第二。尽管《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不好的，甚至“帮风”很浓很重的作品和文章，如转载了《严峻的日子》等，但“四人帮”要完全控制刊物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施燕平也终究只是个执行者而已。

新闻工作与文学编辑，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专业。我决心尽快地完成思维方式的转换。然而在新华社的工作，特别是在1975年驻上海记者组和北大、清华记者组的工作，以及1976~1977年在国际内参的工作，毕竟锻炼了我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判断是非、处理应变的能力，使我终生受益良多。我之所以能较快地投入并适应《人民文学》的编辑、组稿、编稿工作，与我在新华社七年的记者与编辑生涯有莫大的关系。当然与刘剑青和陆耿圣的信任、支持，与阎纲、周明、吴泰昌等同志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编辑文学评论与编辑创作稿件有所不同，前者更多地体现着编者的思想，因此单靠自然来稿是不行的。提出和确定选题，组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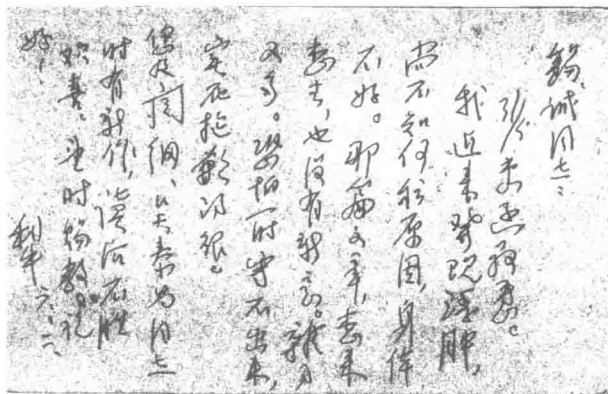


忧虑之情未消,下午我又马不停蹄地到曹靖华的住处,约请他写一篇谈谈散文写作的文章。他是我上大学时的系主任,又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毕业后之所以被分配到中国文联,就是他命我来的。我很景仰他的为人和文章,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我为有了一个拜望老师并向他约稿的机会而感到高兴。“文革”后期,他的散文集《春城飞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在新华社工作,曾与夫人马昌仪到他的住所东安门北街寓所去看望过他,他送了我们一本。我对他的散文有很深的印象。如今他的家已从城里搬到了体育馆东路一幢楼房最北面顶头的单元里。这是“文革”结束后我第一次去见他。因为是楼房,客厅很小,靠沙发一边的墙上,悬挂着董必武在读了《春城飞花》后写给他的诗篇立轴:“愿花常好月常圆,幻影于今现眼前。洁若水仙幽若菊,梅香暗动骨弥坚。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谢庄作赋惟形象,愿否同名喻续篇。”落款:“读《花》时得二绝句,录呈靖华同志晒正,董必武未是草(1963年)四月一日。”我谈了读《春城飞花》的感想,请他就散文的写作,给《人民文学》写一篇创作谈的短文。谈起《春城飞花》来,他满腹愤怒,对我说起“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北大的初澜如何炮制文章批判他,说这本散文是继“晋剧《三上桃峰》之后又一束为文艺黑线招魂的黑花”,它的出版“具体地说明,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文章没有出笼,“四人帮”就垮台了!

7月21日,我同阎纲一起赴天津,到多伦多道孙犁的住处向他约写《谈谈短篇小说》的文章。在唐山大地震中,孙犁住的那栋二层楼的顶层被震掉了,我们去的时候,那被震掉的砖茬还赫然在目,许多人都搬了出去,他却依然坚持留在这座残垣断壁的房屋里。阎纲在“文革”前就与他有过交往,所以一见面就谈些过去的人和事,当谈到老婆离他而去,现在只有他一个人时,阎纲和我都为他的生活不幸而唏嘘不已。他当场答应了我们的索稿要求。他问我们当前短篇小说有些什么弊端和倾向。我们说现在短篇越写越长,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毛病。还谈了些别的。他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所写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人民文

学》1977年第8期上,其中就着重谈了当前短篇的弊端。这篇文章刊出后,沙汀读了,曾大不以为然,认为他没有抓住短篇之为短篇的根本特点,于是这成为后来《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发言的重点之一。孙犁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来稿。我还保存着一封他给阎纲和我的信:“我为《天津日报》即将复刊的《文艺周刊》写了一篇文章,现寄上小样三份,请你们分神转呈光年、冯牧、李季三同志,给我审查一下,如有错误,请他们即在小样上斧正。也希望你们给我指正。专此敬礼,孙犁,1978年12月22日。”孙犁的思想和文采使我辈倾倒,他的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更令我们景仰。

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就这样重新开始了。



孙犁给本书作者的信

## 何其芳的逝世

正当我所在的《人民文学》编辑部讨论 1977 年 9 月号的选题的时候,我所景仰的何其芳因心脏病于 1977 年 7 月 24 日下午六时突然逝世了。听到这一噩耗,我感到非常悲痛。这不仅因为我 1957 年刚毕业参加工作时就认识了这位前辈诗人、文学理论家、学者和文学界的领导;也不仅因为他的夫人牟决鸣是我的同事,我因此常常到他的家里去,与他交谈,聆听他的教诲;还因为在“文革”中我曾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罗山一息县干校里劳动,与他朝夕相处了一年多。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他所住西裱糊胡同的家里去吊唁。

我想起许多铭记在心的往事。

学生时代我就读过何其芳的《夜歌和白天的歌》,选入中学课本的《生活是多么广阔》也曾经让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着迷。我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是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1956 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北大中文系邀请何其芳和吴组缃两位先生同时开《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讲座课程。两位知名人士讲同一个题目,这件事本身就有新闻价值,对我们这些学生有很大的诱惑力。况且何其芳与吴组缃两位前辈在观点上是颇不一致的。我所在的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不像哈尔滨俄专和北京外专那样重视学生的口语学习,因有曹靖华、魏荒弩、余振等教授兼作家的优势,而以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为主要培养方向。我们除了基本的俄语课外,几乎每个学生都要修中文系和西语系的全部课程,而且是与中文系和西语系同学同堂听讲,区别在我们多是选修。逢到《红楼梦》讲座时,我是每场必到的。

当时,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那时文学研究所叫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办公地址就设在北大哲学楼的二楼。在 1954 年毛泽东发动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之后,被视为党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何其芳开始研究《红楼梦》,他不仅在北大讲《红楼梦研究》,同时也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讲这个题目,因此,格外引人注目。他认为宝玉、黛玉是叛逆性的典型的论点在文

学理论界很有影响,也印入了我们的头脑之中。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论〈红楼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一书里所收的《论〈红楼梦〉》长文,我想就是在那些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何其芳

我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社会上和学校里掀起了一股对老学者进行学术批判的风潮。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都是这类占风头之先的著作。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在哲学楼的会议室召开了几天的批判所长郑振铎学术思想的座谈会,《中国俗文学史》当然也被列入被批判对象。作为青年

研究人员,我也应邀参加了批判会。会议由副所长何其芳主持。有一天,郑先生向大家说,明天我要到塔什干去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向大家请个假,大家的发言等我回来后再学习。第二天,大家在会议室里坐好后,等了很久,会议主持人还没有来。过了一些时候,何其芳和副所长唐棣华一起走进来,带着一脸的严肃,用低沉的声音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所长郑振铎先生,在飞往塔什干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了!我们的会议不开了。”他悲痛得说不下去了。而原定发表批判文章的《文学研究》杂志,已来不及更改,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决定加出一本《增刊》,除了登载郑先生的生平介绍和讣告外,集中发表生

前友好悼念郑先生文章,也包括何其芳的文章。

1959年,苏联青年汉学家李福清自费访华,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接待他。因为李福清研究的方向是中国的民间文学,副博士论文是《孟姜女与万里长城的故事》,因此何其芳捎信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见李福清,参与谈话,并陪同李氏去逛天桥,听连阔如说《三国》,参观游览天坛、故宫,逛东安市场旧书摊。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李福清带了照相机来,我们一起照了相,他赠给我一些俄罗斯民间木偶和他的上述著作。后来我们有书信来往。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我们的来往就中断了。他到



作者与俄国汉学家李福清(1988, 12)

北京大学进修,在北京的时间相当长,我都避免见到他,始终没有与他见面。但与李福清的交往,到了“文革”中,成为我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受到审查和冲击的重要因素。在“文革”中,我把他的著作的封面和他签了名的扉页撕掉,逃过了抄家的红卫兵的眼睛,保留下来了。“文革”结束后李福清再次来华访问时,我把经历过“文革”还保留着的他的这本著作拿给他看,我们无不感慨系之。李福清1961年第二次来华时,我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下放劳动。他这次结识了顾颉刚先生。他住在民族饭店,冯家升偕同顾颉刚去看他。他向顾先生赠送了自己的《孟姜女》一书,并从此与顾先生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国十分重视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顾先生得到李福清的著作后,也很高兴,急于想知道苏联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和研究孟姜女故事

的。顾先生当时的助手姜又安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他的家里,又懂俄文,顾先生就要他帮忙翻译李福清的这本著作。我从内蒙古回来后,到顾先生家里请他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来作关于《歌谣》周刊的回顾报告,他同我谈起这件事,并向我介绍姜又安。可惜的是,这部译稿在顾先生生前并没有出版。

何其芳在“文革”中备受江青和“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当时学部大院里“总队”和“联队”两派造反派对立严重。在“四人帮”的指使下,有些人对老干部和学术权威们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逼迫何其芳敲着小锣绕场转,逼迫他跪在有玻璃碴的地上,打他,折磨他。即使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他仍然是做什么事都认真负责。下罗山一息县干校后,让他喂猪,他养猪像写研究文章一样认真,伺候猪像伺候人一样充满了感情,在空旷的干校场地上,天天能听到他“罗,罗!”的呼喊声,看见他穿着围裙、扭动着肥胖的身体跟在猪群的后边跑来跑去。他的思想是那样纯洁无瑕,他的神情是那样天真烂漫。即使在心脏病复发中,他也还有宏大的抱负。他的最后一首诗里说:

笑看鼠辈冰山倒,能令龙骧晓日信。

敢惜蹒跚千里足,还教田野踏三春。

这样一个我所尊重的学者和前辈不幸逝世了,我想为他最后做一点事情。我打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写的回忆录。这是我唯一拥有的权力。我从他的夫人牟决鸣手里拿到了《历史研究》杂志为他打印的回忆录的讨论稿,并在得到她和子女何凯歌等的同意后,选择了其中的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题目就叫《毛泽东之歌》。

我最为欣赏的,是他写毛泽东对他谈“共同美”的那一段。因涉及对毛泽东的回忆和毛泽东的原话,我请示刘剑青和张光年,得到他们同意后,便把校样送给国家出版局的局长王匡审批。王匡于9月1日批示说:

此文粗看一遍。我觉得可以发表。主席的话,问过了,不能发表,只可用叙述式引出,我且代庖了。全文错字很多,想系未校样,请嘱人注意订正。高统购一节,文章示明,删去为宜。今后有关此类文章,请送(王)子野同志,因为他到底是你们的“家”也。王匡九月一日夜。

收到王匡的批文后,文章略作加工就发稿了。

在此,需要把事情缘起做个交代。1960年,反修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了。文学研究所根据党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编辑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该书编成后,由所长何其芳撰写了序言。因事关大局,序言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961年1月4日和1月23日先后两次召见何其芳去中南海颐年堂他的住处,与他谈话,并亲笔对序言做了修改。何其芳回忆录的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写的就是毛泽东与他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和接见他时的情景。

何其芳在回忆录里写道:

毛主席说:此文粗看一遍,我觉得可以发表。主席的话,问过了,不能发表,只可用叙述式引出,我且代庖了。全文错字很多,想系未校样,请嘱人注意订正。高统购一节,文章示明,删去为宜。今后有关此类文章,请送子野同志,因为他到底是你们的“家”也。王匡九月一日夜。

送审校样及王匡批示

是否也有一些共同的美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它说:我们的五星红旗为什么美观?是因为它代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但我的全部问题似乎并不是这样简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国徽的时候,筹备会第六小组的报告关于国徽图案有一个说明,认为“红色旗面三分之一处加黄色长条面以五角星位于上角,这一形式较其它形式似乎更好些;黄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黄色长条面可以代表中非居民友好团结的黄河”。在大会投票的时候,我邻座的一位代表是大学教授,他接受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推荐,决定投那个图案的票。临到我投票的一个图案的票。我把大会发的有几十张设计的图案翻看了一遍,选定了五星红旗。我们各投各的票。投票结果,大多数人都选了五星红旗。这位教授临投票时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五星旗能获得多数票的?”我说:“我哪里预先知道。我只觉得它美罢了。”这就是说,在国徽图案还没有成为国徽以前,在它还不是代表国家而仅仅是被选作国家象征的时候,它也有美或不美的问题,美或者更美的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还不是想以它说明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虽然五星红旗获得多数选票,肯定其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会只是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层认为五星红旗美。但无论如何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五星红旗被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多数选定为国徽,首先是因为它本身是美的。它成为我们的国徽以后,我们就热爱它,尊敬它,觉得更美了。这种美就不仅是图案的美,而是更有社会意义了。

毛主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毛主席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

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

“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史沫德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剧的东西。

人类是否有共同美的问题，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说人类有共同美，这种观点曾经被说成是阶级调和论、宣传人性论。现在毛泽东自己说话了：“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他还引用了孟子的“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的话。何其芳亲耳听到毛泽东的这番话，但并没有及时地公布出来（当时也没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而是到了晚年，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才借写《毛泽东之歌》的回忆文章的机会，把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理论问题上的看法公之于众。在叙述了毛泽东的谈话后，何其芳还对此发表了一通议论：

美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阶级之间是否也有一些共同的美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它说：我们的五星红旗为什么美呢？是因为它代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但美的全部问题似乎并不是这样单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国旗的时候，筹备会第六小组的报告关于拟制国旗图案有一个说明，认为“红色旗面三分之一处加黄色长条而以五星位于上角，这一形式较其他形式似乎变好些；盖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黄色长条则可以代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黄河”。在大会投票的时候，我邻座的一位代表是大学教授，他接受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推荐，决定投那个图案的票。他问我投哪一个图案的票。我把大会发的有几十张设计的图案翻看了一遍，决定了五星红旗。我们各投各的票。投票结果，大多数人都选了五星红旗。这位教授惊讶地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五星红旗会获得多数的票？”我说：“我哪里预先知道。我只觉得它美罢了。”这就是说，在国旗图案还没

有成为国旗以前,在它还不是代表国家而仅仅是被选择的草案之一的时候,就有美或不美的问题,有美或者更美的问题。

我举这个例子还不是想以文体说明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虽然五星红旗获得多数的票,肯定其中有工农兵的代表,不会只是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层认为五星红旗美。但无论如何,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五星红旗被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多数选定为国旗,首先是因为它本身是美的。它成为我们的国旗以后,我们就热爱它,尊敬它,觉得它更美了。这种美就不仅是原来的图案的美,而是更有社会意义的美了。

毛主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根据我们理解,各个阶级感到共同的美又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不同的阶级性的差异的。正如“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同嗜之中仍包含着不同一样。

是又不是,存在又不存在,同又不同,这不符合形式逻辑,但却是符合辩证法的。

何其芳用毛泽东的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美的意见,批判“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形而上学。他说,“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认为,“承认各个阶级有共同的美,就是人性论。即使认为各个阶级感到的共同的美仍然是又同又不同,仍然有阶级性的差异,也是绝对的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人性论”。

何其芳的回忆录中的《毛泽东之歌》,经过王匡的审查,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发表了。我组织并提供的何其芳的这篇遗作,也寄托了我对这位前辈学者和文艺理论家的哀思。文章发表后,不出所料,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人们最为关注的,与我最初的直觉一样,是毛泽东关于共同美的意见。

何其芳晚年写的那本回忆录,在他身后收入由他的弟子们编辑的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集最后一篇文章是作于1977年4月的一首旧体诗《偶感》。